

第一章 緒論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國內、外相關研究中，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是探討新聞建構真實不可忽視的一環（臧國仁，1999）。研究證明，每天在媒體上呈現的新聞，事實上就是來自記者與消息來源的建構（Gieber, 1960），或者說是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組織間的互動結果（臧國仁，1999）。因此，記者如何與消息來源互動，在新聞領域裡似乎成爲一門顯學。這些研究結果對於身處新聞領域之外的人來說，是在獲取一則新聞時，多一分對新聞產製的瞭解，增加更多對新聞的詮釋與質疑。對身處新聞圈之內的記者而言，在於發展適當的因應策略獲取新聞，完成每日工作，並期望在這樣的認知與實踐中報導出更趨近於真實的新聞。

但從文獻中發現，不論是早期 Gieber & Johnson（1961）將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互動分爲三種類型，到後來許多研究，選取不同路線記者與不同類型消息來源的互動觀察，而發展出的互動模式（Miller, 1978；紀效正，1989；陳志杰，2002），或者依消息來源特性去畫分不同的互動類型（喻靖媛，1994），都略談一個重要環節，那就是記者不是一個獨立個體，而是屬於媒體組織的一部份，所有從消息來源處獲取的新聞，都要再經過媒體組織內一定的生產流程之後呈現；也就是說，記者在每日的新聞採訪工作中，必須同時面對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就像 Roshco（1975）所說的，記者扮演的是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組織間的「中間人」角色（轉引自臧國仁，1999）。

因此，記者從消息來源處獲取訊息並形成報導後，接下來要面對的就是組織的控制與管理，過去有關組織對記者的控制管理研究也相當多，包括新聞室社會

化、記者工作常規、採訪路線安排、新聞截稿時間、版面控制、編輯新聞價值取舍等（Breed, 1955；Shoemaker, Eichholz, Kim & Wrigley, 2001；Tuchman, 1978）。

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都在探討每一則新聞呈現背後可能受到的影響因素，也就是記者在產製新聞過程中，如何受到媒體組織編輯、政策等的控制，這也讓閱聽人了解，新聞事件並非如想像般自然發生，在新聞產製的過程裡，經常是受到許多人為干預與非自然的因素影響。

但基於研究目的的不同，這些研究多只將焦點放在記者與媒體組織的單方面關係，僅去探討媒體組織如何控制記者，或是記者如何爭取新聞自主、如何對抗媒體老闆（何榮幸，1996；林淳華，1996；張文強，2002；楊汝椿，1996；陳順孝，2003；蘇善村，1995；蘇正平，1996），同樣忽略記者在與媒體組織互動過程中，消息來源也是重要的外來壓力來源。然而，這股壓力不僅影響記者在面對媒體組織時的選擇，更會影響記者在媒體組織中的處境與地位，進而影響記者面對權力控制時所採取的因應之道。

對記者來說，當面臨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兩面施壓狀況時，如何運用策略調節雙方，也成為記者必要的工作重點。這也是本研究所要強調的，即記者必須有能力處理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雙邊關係，而非只是單向和消息來源互動，或僅僅處理與媒體組織間的關係即可。

這就是說，在新聞記者研究領域上，要處理記者面臨權力控制這一部份問題時，必須將記者與媒體組織之間的關係及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同時放在一個圖像中觀察，也就是必須同時探討媒體組織、記者與消息來源三者間所產生的交互影響，因為記者所處工作環境的壓力來源，事實上是來自於媒體組織與消

息來源兩方面，一旦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的立場相左，或是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立場一致，但卻與記者的自主意識相違背時，都會產生記者被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兩面施壓的狀況。

進一步解釋，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是合作、互利關係。也就是說，當消息來源提供訊息給記者後，總是希望獲得新聞版面的回饋（劉駿州，1995）。但當報社與消息來源立場不同時，記者傳回報社的新聞最後呈現的面貌若不如消息來源所預期，則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互利回饋關係可能因此生變，記者呈現的角色期待就非消息來源所預期。或是報社希望記者做出符合報社立場的新聞，但消息來源無法提供時，記者即無法達成報社希望其扮演的角色期待，組織帶給記者的壓力也就會隨之而來。又或者，報社與消息來源立場一致但卻與記者的想法不同時，此時記者在自我期望上就會出現落差，自然也會感受來自雙方的壓力。

由此看出，記者擔任這個「中間人」角色並不十分簡單：記者在面對來自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雙方壓力時，所行使的抵抗策略不會只是單面向地顧慮如何處理消息來源或是媒體組織，而須顧及兩方，或是拿媒體組織這邊的資源去抵抗消息來源，亦或是用消息來源這方的資源去抵抗媒體組織。

不過，在探討記者累積可行的抵抗資源之前，必須先釐清有關施壓的權力控制問題，因為唯有清楚了解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對記者施展權力控制的實際狀況，才能有效找出可作為因應的抵抗資源。值得注意的是，在媒體環境中的控制形式除了傳統關注威權式的、強調從上而下，來自老闆、主管直接的權力控制外，還有更多規訓的權力控制形式（劉北城、楊遠嬰譯，1998）。可想而知，這種無形、隱晦的權力控制形式常使記者難以察覺受到控制，也難以體認壓力形式。

因此，本研究目的（一）在探討記者處在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雙重壓力下，

如何累積抵抗資源，(二) 在尋找可以累積的抵抗資源過程中，清楚了解媒體環境中的權力控制形式，(三) 記者面臨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雙重壓力下的情境類型有哪些，(四) 以利記者在生存並抵抗的情況下，順利、有效地達成新聞工作，並受到肯定。

貳、研究問題

- 一、 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對記者的控制形式有哪些？
- 二、 記者面臨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雙重壓力下的情境類型有哪些？
- 三、 記者能否迂迴抵抗？
- 四、 記者可以累積的抵抗資源有哪些？

參、名詞解釋

一、 權力控制

權力是什麼？按照 Giddens (1976:127) 定義，權力是行動者介入一系列事件使之改變方向的能力。當利用改變的能力透過特殊的支配結構達到確定結果時，就是一種權力運作 (Knights & Vurdubakie, 1994)，也就是權力控制的過程。馬克思的傳統權力控制觀點，強調少數人在資本累積過程裡如何透過意識形態和掌握在少數人手上的物質資源去擴大控制 (Rothschild & Miethe, 1994)，屬一種上對下、直接的威權控制形式，且發展於階級的對立與衝突。

但法國哲學家傅科 (M. Foucault) 則對馬克思的傳統權力控制觀點提出修正，認為權力的命名來自一個和諧的社會關係，這使得社會秩序的結構成為「可理解的格子」 (grid of intelligibility)：權力不是一個機構、也不是結構，更不

是確定賦予的力量；權力不被擁有，而是存在社會關係裡（Knights & Vurdubakie, 1994）。他提出規訓（discipline）的權力控制觀點，以軍隊、學校、醫院、監獄對人體的訓練為描述，指規訓是一種支配活動人體的微分權力（infinite-small power），其控制力量是柔順的，不是強化對人體的征服，而是建立一種關係，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柔順（劉北城、楊遠嬰譯，1998）。當權力透過規訓的力量展現，往往具匿名性，因此被控制者通常會不自覺。

綜合以上得知，組織的權力控制，不只是透過上層，由上而下直接規範、懲罰或禁止，還會透過一些不直接的規訓方式行使權力控制。本研究即是同時以這兩種權力控制觀點，探討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對記者的權力控制形式。

二、自我規訓

「自我規訓」（self-discipline）指人們反射出的人格，是以生產性權力的內在組織形式為取向，而不是否定的與抗拒的權力取向；換言之，是屈服於組織內部的權力壓力（Clegg, 1994）。自我規訓的概念也是來自傅科的規訓觀點，他認為權力對個人的運作有兩種方式，一是使個人成為知識的對象而客體化，即可客觀的了解之，也就是可用特殊的方式來管理而受到宰制；二是給與一個自我形象或一種身份，成為自我知識基礎，這兩種方法都提供了個人做為修正、改變其行為的基礎（Townley, 1998）。也就是說，在規訓的權力控制下，受宰制者會透過自我監控，以控制自我的身體、感覺、行為，甚至糾正自我意識，符合管理階層的利益，乃係對於內心世界的一種自我管理方式（Clegg, 1994；Deetz, 1998）。

三、迂迴抵抗

抵抗 (resistance) 是一種下層階級在職場中行使的權力。抵抗雖鮮少能與控制平等，但依照傅科的觀點，有權力的控制就有抵抗，控制和抵抗是相互產生、彼此建構 (Collinson, 1994; Knights & Vurdubakie, 1994)。所以當權力的控制形式以柔順的方式運行時，抵抗形式自然也就不會是直接且粗暴的，反會以一種迂迴抵抗的形式出現。迂迴抵抗是一種暗中的破壞形式 (sabotage)，可能是諷刺、幽默的語言或文字表現，也可能是一種不合作的態度，亦或是私下傳播負面消息讓外面知道等；它可能是在對特定事件時的自發性本能反應，也可能是有意識的反應 (Clegg, 1994; Collinson, 1994; Knights & Vurdubakie, 1994)。本研究強調的迂迴抵抗力量，強調的是記者主動為之的一種抵抗行為，是一種有意識的作為，由於經常隱藏於日常工作中，因此也會自然而然成爲一種本能反應。

四、抵抗資源

資源 (resource) 的原始意義是指財富、貨物的供給，也就是有助於做某事的支持和幫助 (張芳杰主編，1984)。本研究要找尋的，即是可以帮助記者行使抵抗的支持和幫助。這些抵抗資源將成爲記者的財富，遭遇權力的控制時，隨時可以提供支援與應用。